



提着铜火罐取暖的3个小孩。

住筒子楼的时代

□讲述人：蒋玉华（成都）

1980年我们结婚后，老公在单位有幸分得一间房子。房子由办公楼改建，共3层，每层8间房，每间大约20平方米，外墙是红砖，里面刷了一层白石灰，没有厨房、厕所。

那家人煮饭，在门口走廊上放一个蜂窝煤炉做饭，用砖和水泥板搭一个案板，下面放蜂窝煤，上面放锅、碗、菜板等。自来水是一层楼一个共用水龙头，外面大街上有一个公共厕所。

在那个年代，能分得这么一间房，都是很幸运的了。一二楼住的是工薪阶层的职工，其中以转业军人居多。二三楼以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居多。我家在3楼，采光比一二楼好，站在走廊上能看见楼下院子的全景。

那时物质条件虽然不好，邻居之间却十分友善。一回到家，从不同门，要串门直接走进去。到煮饭的时间，特别热闹，你家吃什么，我家煮什么，一清二楚。大家一边煮饭，一边摆谈家事、厂事、天下事，时不时还开着善意的玩笑。

住筒子楼里，也有很多方便的地方，如哪家的炉子熄了，就拿一个煤到别人炉子上烧燃，到别家没做饭的炉子上煮饭。做饭时，缺点葱姜蒜什么的，或想吃一个什么菜又不会做，大家都会提供方便。

我刚生儿子时，不会给婴儿洗澡，潘姐来教我们：老公杀鸡半天整不好，大面师傅抢过去，三下两下就收拾利落，还对老公吼道：“等你把鸡炖好了，月母子都饿死了！”

有段时间，厂里整顿考勤，必须要12点才能下班出厂门，那时的孩子放学都是回家吃饭。大人

安乐寺

□讲述人：林振国（龙泉驿）

/老成都故事/

就连武侯祠，成都人一般也都叫武侯祠，所以这里沿用习惯叫法。

解放后，这儿改成菜市场。虽说改了名，可附近老百姓还按习惯叫：“哪儿去？”“安乐寺。”不用说，是去买菜或买肉。

我家在人民东路，对安乐寺还算熟悉。记忆中，它的格局为：两侧的廊廡，被隔成一间间小屋，成为贩卖各种杂货的商铺，如卖盐巴、海带、辣椒面、豆腐干等。

中间场地搭了篷，分两行，是时鲜蔬菜的卖场：青菜、萝卜、豆角、黄瓜等。也有几架肉案子，卖肉的穿的鞋子很特别：厚厚的木底上缀满指头大的铁疙瘩，走起路来咔嚓咔嚓响，鞋面是棕绳编的，有点像戏台上武生穿的厚底靴。这种鞋子是为这一行特制的，防滑，现在已经见不到了。

正殿在台基上，有石阶，不算

老成都人都知道安乐寺，位于城中心，人民东路和顺城街原成“丁”字形，横竖交汇处，便是安乐寺原址。后来修蜀都大道，向东拉通成“十”字，安乐寺就消失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安乐寺左侧是人民电影院，右侧第一家招牌为夫妻肺片。中间一条小巷，往里走几步，便可看见安乐寺的门口：一道青砖门，白灰勾缝，估计不是正门，这一点从形制上不难判断，进门倒左拐，方能看见正殿，门是朝西的，正殿为坐北朝南。

安乐寺是后主刘禅的祠堂，这点知道的人不多。祠堂建于何时，已无从可考。我至今想不通：何人会为他建祠堂？晋惠帝时，八王之乱，刘渊称帝，立国号为汉，永元元年（304），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，不知是否与此有关？

本是祠堂，人们习惯称为寺，

吃顿回锅肉，长一身虱子

□讲述人：刘斌（西昌）

水，这样炒出来的回锅肉油就比较多，看上去油汪汪的，再加上蒜苗一炒，回锅肉就炒得香喷喷的，太诱人了。

把大块肉往嘴里塞进去，再一嚼，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。嚼着回锅肉的同时，两个嘴角都在不停地流油。

几个人吃得津津有味，有说有笑。那晚吃的那顿饭，可说是我下乡以来吃得最美味、最解馋的一顿饭，肚子都吃圆了。

吃完晚饭，已是晚上11点左右。天很黑，要回到住处必须走一段河滩、很长一段河滩、吊桥、一段机耕道，才能进村，进村后还有很长一段路才到家。

他们叫我不要回去了，就在这里住一晚上。由于路很远，我也有点怕走夜路，就同意了。睡觉的地方在粮仓房屋的二梁上，

1976年秋收开始的时候，生产队安排我在场坝里晒谷子。半个多月时间，谷子基本打完了，大部分人不再到晒坝里来了。我们晒场的任务更重，满满一仓库刚打下来的谷子都要及时晾晒。

我们一连干了10多天，累得要命，天天中午吃点老干饭，有时还是冷饭，基本上没有任何油荤，饥肠辘辘。

场坝上领头的姓王，是个退伍老兵，脚有点跛。这天，他用生产队的谷子偷偷地和镇上卖肉的换了一块猪肉，悄悄地给我说：“今天晚上吃回锅肉。”一听有回锅肉吃，我当然高兴了。

为避人耳目，那晚9点多我们才吃晚饭。主菜是蒜苗炒回锅肉，还有肉汤煮青菜。

在乡村，炒回锅肉的肉煮得比较软，而且在炒的时候要续点

让子弹飞，壳留下

□讲述人：杨力（金堂）

其实，并不是每个战士的衣兜里都有子弹壳。部队不是每次训练都要打靶，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期望与失落中煎熬折腾。

有一天，我发烧，输液液赶去路口晚了一点，小朋友们已把战士们的衣兜捋了一遍，根本赶不上潮的衣兜单独站在一边。

部队已经过去了，小朋友们也一哄而散，就在我委屈得想哭的时候，走在后面的一位背短枪的解放军叔叔走了过来。

他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又怜爱地到了刮我鼻子，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颗子弹壳给我。我一看，发烧带来的身体不适全忘了，眯着眼，笑得一脸灿烂。

那颗子弹壳让我在一帮小屁孩中很是炫耀了一阵，我甚至认为从此就和那位背短枪的解放军叔叔有了特殊关系。

我小时候，父母单位旁边是驻军。还在穿衩衩裤的我，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：一是每天在军号声中迎接朝阳，在军号声中进入梦乡；二是每天中午捧着饭盒去部队食堂，食堂里的臊子蒸蛋时诱惑着我小身板里的馋虫。

很多战士喜欢和我们一帮小屁孩玩耍，不管是打滚撒欢还是藏猫猫打泥仗，那些大多七八岁的战士也尽显童真。当然，最让我们眼馋的，还是这些战士打靶训练后带回来的子弹壳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我们会簇拥在部队训练回来的路口，翘首盼望战士们回归。当他们列队走过时，孩子们不管不顾地冲过去，有张口索要的，有直接伸手去掏衣兜的。得到子弹壳的小朋友欢天喜地，两手空空的小家伙则一脸失落。

赶场

□讲述人：赵建国（江油）

摸摸衣兜，每次赶场，我只敢要一碗臊子面（1角钱）和一碗干饭（3分钱）。

肚皮填饱后，我们返回。在蜿蜒的山路上悠悠地行走，大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。

1967年夏天，正是农忙第二道玉米草的时候，我干活时穿的胶鞋坏了，第二天是逢场天，我决定到公社赶场买双新胶鞋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出门时碰上素莲姐也要去赶场。我问我：“正是农忙的时候，你有啥急事去赶场？”她脸一红：“我们炊事班3个女同胞没有卫生纸了。”

那年我15岁，素莲姐20多岁。她个儿高高大大，人长得很漂亮，性格豪爽大方。俗话说得好，“男女搭配，走路不累。”我们

1966年10月，我们平武县城关镇40名青年来到岷江马家公社前锋大队半山腰的大渠园生产队落户。过上十天半月，大家耐不住深山老林的寂寞，就要找理由到公社去赶一次场。从生产队到公社有五六十里山路，路上人烟稀少，一个来回得一天时间。

我们到公社赶场，一是去供销社，二是到公社办公室和邮电所等，三是下馆子。因为只有供销社，我们才能买到日用品。

在供销社买到东西后，有的到集市上逛，有的到邮电所看看有没有家信或汇款等。

中午，大家下馆子。向跑堂儿的一阵吆喝后，有的桌上有酒有肉，有的人面前只有两碗油醋

冬天再冷也不怕



小孩子用护手取暖。

老成都有取暖神器

成都的冬天阴冷而潮湿，有霜有雪的日子里，丝丝寒气从脚底窜入，漫长的冬夜能把人冻得直哆嗦。好在当时的成都人想了很多法子取暖，烘笼就是当时的取暖神器。

烘笼这种取暖方式，在中国南北方都有，因地制宜，制作材料多有不同，叫法也大相径庭。成都人爱把竹编的叫烘笼，南方人爱把铜制的或铁制作的叫火熨（cōng）。成都著名民俗专家刘孝昌老师说，当年的老成都家里，一到冬天，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必备烘笼或炭盆。

冬天烘笼取暖很方便，木炭或木块燃烧后，红红的炭火放到烘笼里，烘笼里一般有个倒扣的泡菜坛子盖子或土巴碗，炭火放到里面慢慢释放热量，可以持续保温2-4小时。双手放在上面，不停搓动，身体一会儿就热乎起来了。

还有怕冷的老人，喜欢在上床前把烘笼放到被窝里，把棉被烤热，免得睡进去僵手僵脚。当然，在冬天里也可用来给婴儿烤干尿片、尿裤子。更有甚者，还可以在烘笼里烤红薯，几小时取暖后，靠炭火烤热的红薯也变得香甜可口，成了宵夜的好食物，真是做到物尽其用了。

这种取暖方式经济简便，当时家家都有木炭，一个烘笼炭火渐熄后，从灶塘里取出几块重新装入就行，基本上不花什么钱。

刘孝昌说，南方人多叫这种取暖的东西叫熨。有钱人家多用铜火熨，经济条件差点的用铁的或铝的。火熨多用黄铜铸造，取暖的原理和四川的烘笼大同小异。

到了冬天，从灶塘里取一些柴炭放进火熨里，再铺些平时留存的木炭，盖上满是洞眼的盖子，把脚搁上去，不一会儿，脚底的暖意就上来了。

烘笼烤红薯，火熨可煨豆。江浙人喜欢把蚕豆（即胡豆）放入火熨里，盖上盖子。待火熨里发出“噼噼”的声响后，揭开盖子，用筷子一粒一粒把蚕豆拈出来，大家分着吃。虽然每次都没吃上几颗，但那种扑鼻的香味及煨豆的乐趣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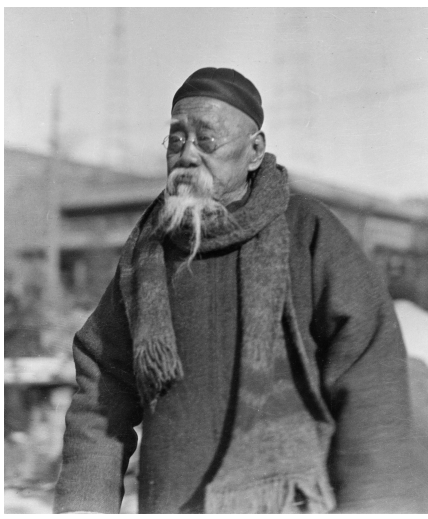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私塾里，上学的小孩子怕冷，取暖神器火桶派上用场了。火桶用木板箍成，无底无盖两头空，中间装有站人的搁板，下放一只火盆，把孩子烘得热乎乎的。

你别说觉得危险，火桶上口小、下口大，竖在地上非常稳当，小孩子站在火桶里，随他拆天拆地都不会翻倒。

棉帽、手套、围中、护手包，还有热水壶，是有钱人家在冬天的装备。当时的热水壶都是手工打造的铜壶，扁扁圆圆的，壶顶有小盖，便于往里添加鲜开的热水。使用时，在外面包一块绒布，以免烫手。

如今，这些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取暖神器，大多已没了踪影，它们赋予生活的那份温暖记忆，还依稀留存老成都人的心里。

围着围巾的白胡子大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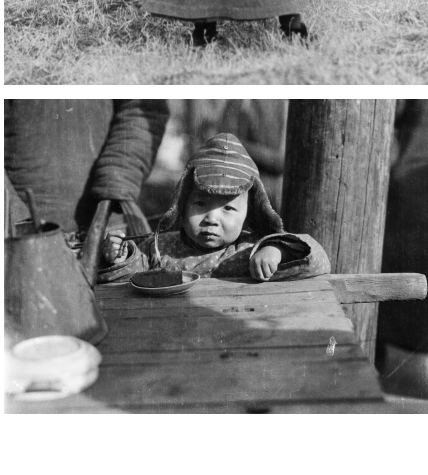
围着围巾的白胡子大爷。



冬天里穿得暖暖和和的妇女。



手持鸟笼的男子。



食物也能取暖。小男孩在冬天吃点热乎

/背景资料/

美国人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，1917-1919年在中国拍摄了5000多幅黑白照片、500多幅彩色幻灯片、30盘16mm电影胶片。其中，他在四川拍摄了数百张照片。

老照片作者：西德尼·戴维·甘博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更多新闻资讯